

百年前颐和园的经营之道

庄士敦力促溥仪移居颐和园

民国二年(1913 年),步军统领衙门(1924 年裁撤)制定了《瞻仰颐和园简章》,规定所有参观者必须经外交部批准,发给门照后并通知清室内务府,才能入园参观。后来,又改为外国人参观由外交部批准,中国人参观则由内务部或步军统领衙门办理。同时,对于参观颐和园还有人员身份的限定,即只允许“政、党、军、学界”人员参观,并规定各界每次入园参观者仅限 10 人,且 3 天前就得将参观者的姓名、年龄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后才能入园参观。即使如此,颐和园还限定,在农历每月逢六日才开放。

没多久,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每年还要给皇室 400 万元经费,为增加收入,1914 年 5 月,步军统领衙门与清室内务府形成默契,颐和园正式向社会开放,并出售门票。

当时的《颐和园试办游园售券章程》,将游览时间定为每日早 8 点至下午 4 点,进门券每张售大洋一元二角,排云殿、谐趣园、玉泉山等处需另外购票。开放以后,每月平均卖票收入约 2000 元左右,并逐年增多。其中 2/3 归清室内务府,1/3 由步军统领衙门掌握。

当时,溥仪虽已退位,在紫禁城“暂居”了好几年,且一直没主动搬出紫禁城而移居颐和园的打算。直到一个外国人的到来,才渐渐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庄士敦。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 1898 年起,

庄士敦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等职务。他曾遍访中国名山大川,熟悉各地风土人情,还通晓中国历史,是个“中国通”。1919 年 3 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联络,庄士敦被清王室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来到紫禁城执教。

庄士敦到来后,曾力主溥仪对内务府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极力主张清室移居颐和园。1924 年 5 月,庄士敦被溥仪任命为颐和园的主管。但当年 11 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庄士敦的职务也随之中止。庄士敦主持颐和园管理的时间虽短,但他为管理和整顿颐和园采取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

最初,面对颐和园内机构臃肿、人员众多的现状,庄士敦把那些只领薪水而不干实事的人称为“食客”,有机会便裁减冗员。另外,针对颐和园里一些年久失修的建筑物的重新修整,庄士敦引进了招投标的先进理念。庄士敦的这些措施使得颐和园的局面大为改观。

文人雅士赏游颐和园

1924 年 11 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颐和园后,民国政府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清室内务府将园内所有殿宇都进行了查封。在这一阶段,颐和园变动不大,且依然实行对外售票开放的政策。

当年一些文人墨客的游记,记载了颐和园的诸多细节。1925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吴虞,于 7 月 9 日(农历五

月十五)的日记中,记载了几天前,他带家人到颐和园游览的情况:“同三女四女,坐汽车游颐和园。往来车费十元,酒资洋一元。门票洋一元二。人排云殿又买票,每人洋五角,谐趣园又买票,每人洋二角。西餐洋十元,饮茶洋七角六。汽车场停车费三角。购买的颐和园图一张,洋一角。四女为予买枣木手杖一根,洋五角……湖中有舟,游湖可三元则至五元。”

吴家父女三人游一次颐和园,竟花去大洋 30 多元,而当时一般家庭的月收入在 10 元左右,一次游园,花去了一般人家近 3 个月的工资,如此昂贵的票价,自然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承受。

1928 年 7 月,民国政府成立“内政部颐和园管理事务所”,接管清室办事处颐和园事务所,颐和园自此正式成为公园。尽管颐和园的门票比当时的其他公园要贵,但“湖山幽胜,殿宇崇弘”的颐和园还是受到部分人士的喜欢,特别是附近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子们可以在春假、秋假时,购买预先出售、低于正常售价的门票,借此一窥皇家苑囿真容,因此颐和园的游人日益增多。

颐和园的出租业务和渔场生意

民国政府接管颐和园后,鉴于颐和园绝佳的风光,出租业务极有市场,1929 年,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将全园存量房屋加以整修,开始向个人提供租住服务,并把园内出租房屋定位为“高尚休憩之所”。为了便于规范管理,满足不同租住者需求,事务所按照房屋原有使用功能、地理位置、面积大小、室内装陈等情况,将房屋分为甲、乙、丙三等,到 1936 年共有 60 余处房屋出租。

鲜为人知的是,著名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当时就是租客之一。1938 年,他租住在颐和园排云殿

西侧的云松巢,入住后,他曾写过一首诗:“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官簪注起居。”诗后小注说:“云台晚岁艰困,租居颐和园。一九三八年,余亦于颐和园租一房舍,时相往来。”“云台”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他们两人的住所相距不远。

据说,当时张伯驹去拜访袁克定,袁克定正在用餐,吃食很寒酸,但袁克定还像过去似的胸戴餐巾,正襟危坐,张伯驹不禁感慨万千。

此外,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作为北京西郊重要的湖泊之一,水产丰饶。1928 年新设立的颐和园管理事务所打算售卖昆明湖中的鱼,作为一条增收的捷径。颐和园卖鱼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市民争相购买,都能吃到“皇家鱼”为荣。可好景不长,由于湖鱼数量逐渐减少,鱼价也越来越高,市民开始不满起来。

同年,河北省宛平县一位叫韩忠悃的人,申请承包颐和园昆明湖的渔业。韩忠悃曾做过河道勤务,有水产养殖经验。经事务所上报,北平特别市政府核查后,向韩忠悃颁发了捕鱼执照,准予开办渔场。

韩忠悃承办渔场后,很多商人发现昆明湖每年出鱼数量巨大,获利颇丰,他们便联名向北平市政府请示,以“湖内荷花水藻等物破坏严重”为由,终止韩忠悃的承租合同,重新招投标。此后,有五六家渔商承租了昆明湖的渔场,而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没一位商人能够完成合同承包期并续租。最后,北平市政府重新制定了昆明湖渔场售鱼投标办法,将盈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颐和园被人民政府接管,开始清退遗留在园内的租户,昆明湖渔场也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里,颐和园迎来了新生。

据《北京晚报》刘永加/文

彭德怀鲜为人知的“货币战”

抗战期间,华北的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斗争是从货币战开始的。

1938 年,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经济工作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也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 1939 年 2 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 10 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 3 元之数。1942 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这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形成鲜明的对照。

据《老年生活报》